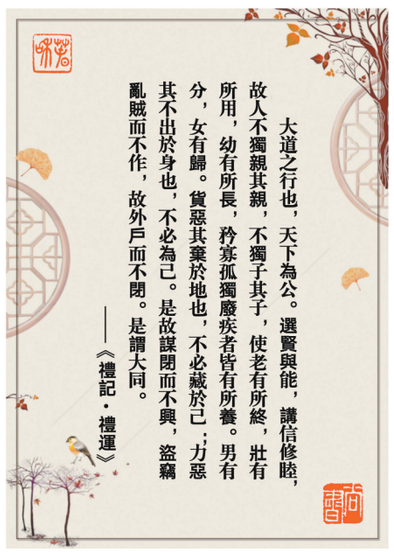
大同思想和郑和文化

——郑和文化节的国际视野

□ 刘仁杰 刘高飞

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当年4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每年的7月11日确立为中国航海日，作为国家的重要节日固定下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日期。这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全国性法定活动日。2006年，“郑和故里”昆明市晋宁县（今晋宁区）也确定每年的7月11~18日为“郑和文化节”，至今已是第15年。如果结合国际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对这个节日的内涵进一步挖掘提高，彰显郑和下西洋伟大创举中的世界大同思想，在不断拓展“郑和文化节”内涵和发展空间的进程中，吸引更多中外游客纷至沓来，把云南特别是昆明的文旅康养产业推上一个新高度。

大同思想出自《礼记》第九篇《礼运》，孔子在答弟子言偃所问时，对“大同”“小康”之治的论述，其中提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早于西方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历史文化底蕴就包括了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和追求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加入了现代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融合的思想。究其核心底蕴，“世界大同”思想中“最大同”的现代概念是：和平、尊重、合作、发展；共商、共建、共享、和谐；平等、公平、公正、民主。



《礼记·礼运》摘录

滇池畔的郑和石雕像

郑和公园三宝楼

大同思想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诸侯割据、战乱频生，周王朝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在当时背景下，孔子处在“乱世”，向往的是“太平盛世”，为了“改制”“救世”，从而提出所向往的“太平盛世”大同理念。这个大同世界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由乱世求小康，由小康进大同”具体化了的、和乐太平的人类理想社会。在《礼记·礼运》中，孔子所作的描述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如果用现代汉语表述，这一思想阐释的核心内容就是：“理想大道，顺达前行，天下为公，人人平等。选贤举能，诚信和睦，四海之内，皆为亲朋……这就是大同社会”。

大同思想汇合、总结了诸子百家的社会理想，既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之一，也是中华文明关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主张。近代以来，康有为在清末撰写《大同书》谋求变革，孙中山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发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确立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

大同思想中蕴含的平等、共享、和谐、民本等思想不仅在古代产生着久远的影响，也对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有着积极意义。大同思想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的价值共识，“公平正义”的治理理念，“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文化理念等，承载了对人类命运的现实思考，它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问题，充实“一带一路”倡议文化内核，推进人类和平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4月8日，习近平主席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2019年11月15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的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断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回顾历史，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展现“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主张的伟大尝试和努力。

郑和是明朝构建大同世界的践行者以及大同思想的国际传播者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为建立大同世界梦想的伟大尝试与努力。在那个时代，明朝作为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国，想将儒学文明传播于海外，共同创造一个儒家文化主张的“仁爱”“太平”的大同世界，因而选择了“协和万邦”的对外方略。

自汉唐以来，中国经济发达，文明昌盛，东亚各国羡慕中国文化，积极引进儒学，因而造就了东亚的儒文化圈，各国对以儒家儒学为主体的先进汉文化的尊崇，铸就了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自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转移，东南滨海区域迅速成长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这些区域与海外有着天然的联系，自古以来海上贸易不断。明朝的统治者十分注重与周边诸国的关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马上派出使者到周边国家宣告明朝的建立。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朱元璋急需周边国家承认大明王朝已经取代了四处征战吞并掠夺他国但已经没落的元朝，恢复了儒家思想主导的“以德服人”的传统理念，以便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地位。回顾历史，中国没有一个朝代这么主动地派遣使者到海外建立广泛的国际关系，这体现了明朝不同以往的国际视野。

朱元璋对海外国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这是儒家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传统的体现。明代的儒者认为，应该把儒家文化和治理思想推广海外，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儒家理想世界。郑和在西洋的行动十分谨慎，虽说他有强大的武力在手，但并不滥用。首先，郑和始终坚守“以德睦邻”，更多的时候是恩威并重维护和平，他曾以和平方式三次化解干戈，避免小国之间军事冲突，引导其他国家前来学习中华文化。其次，郑和从不以大欺小，而是在“厚往薄来”中与当地开展平等的商品交换。如果郑和纯粹以商业利益为目的，以商养军，就不会出现财力负担过大在朝廷内招致反对的情况。他用实际行动宣告各国：以武力征服占有，不是也不符合大明朝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传统。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据《明史》记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远航外交活动获得前所未有的硕果，扩展了中华文化圈和明朝中国的世界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郑和远航的文化基因底蕴，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即“四海一家”“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文化思想理念。郑和是史无前例的构建大同世界于海外的践行者；“郑和之后无郑和”，郑和是世界大同文化绩伟功丰的传播者，留下了宝贵的无形资产，至今仍在其航海沿途国家产生影响。

打造“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的建议

郑和是我国走向世界、践行世界大同情怀的历史文化名片。郑和远航的伟大创举，还有不少值得深入研究和开发运用的历史文化内涵，特别是其中所蕴含、凝聚和倡导的“和文化”“和谐世界”“大同世界”等思想理念，从当前和长远来看，不仅可以从文化根脉的出发点来诠释和平发展的理念，也为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借鉴。但是，从全国来看，能够深入全面地诠释好郑和文化的文化旅游项目寥寥无几，运用郑和远航创举诠释、展示“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中华大同文化的文化园更是空白。

从云南来说，建设旅游强省，实现“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的旅游发展目标，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乃至世界级的文旅新地标、跨越式发展的新动能。郑和是云南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郑和故里”是云南最宝贵的文化品牌和名片之一。郑和远航是华夏文明对外交往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和宝贵的历史文化名片，有必要以此为依托，在滇池湖畔的郑和故里昆明市晋宁区打造“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让其成为展现国际外交、文旅往来以及跨国合作历史、现状与未来的世界级文化平台，让它成为云南乃至全国文旅新地标、跨越式发展新动能。

为每年举办中国航海日、郑和文化节纪念活动提供适宜会场。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之久、规模之大、航程之远与抵达国家和地区之多，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比欧洲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时间早了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当代美国史学家路易斯·利瓦塞斯这样评论：郑和船队在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可以与之相匹。英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则写道：世界上第一个远洋舰队由郑和率领，27800名官兵分乘208艘船舰，驶向三大洋。自2005年确定郑和下西洋首航纪念日7月11日为“航海日”以来，每年举办中国航海日活动庆祝大会的地方都不固定。按照“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的目标建设“郑和故里—世界大同文化园”，可以作为中国航海日、郑和文化节纪念活动的永久会场。

（作者单位：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 图片摄影：耿嘉）

云南近代以来爱国主义革命斗争事迹概览（二）

（1840～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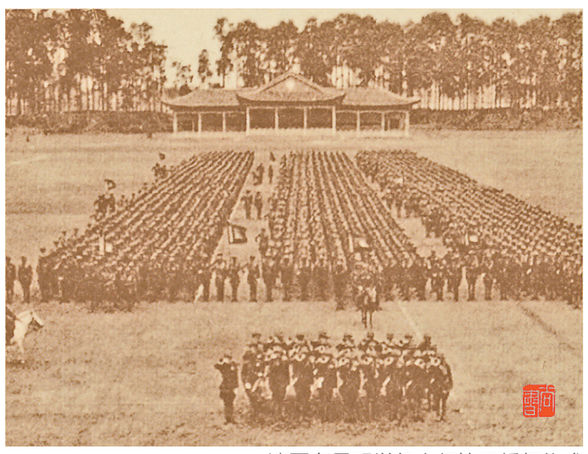
□ 马颖娜 梁初阳 曾黎梅

云南五四运动（1919年5月）

1919年5月中旬，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云南，云南民众积极响应，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谴责北洋政府卖国行径，号召滇人起来，争回青岛，抵制日货。通过“宣言”及致全国和巴黎和会专使之通电多件，要求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提出及巴黎中国专使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否则“誓不承认”，数千人举行游行示威。6月4日，由云南省议会、总商会、报界联合会、教育会、实业改进会、省农会、救国会、和平会、三迤总会、三省联合会、国民后援会、尚志学社等团体发起，在云华茶园（位于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内）召开国民大会，各界群众上万人参会。会议历时3小时，通过了多件宣言及通电，痛斥北洋政府卖国行径，号召滇人起来和全国人民一道挽回外交败局，争回青岛，抵制日货，并预备最后以武力解决。会议呼吁：“声讨国贼，抵制日货，不达取消中日不平等条约，誓不终止。”致电巴黎中国专使“万勿签字”“若竟签字，誓不承认”。下午2时，与会群众学生数千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还我青岛”“挽回国权”“反对二十一条”等口号。同年7月25日为抵制日货、12月25日为抗议日本军舰入闽逞凶，云南国民大会均分别召开。

抗击英国侵占班洪（1934年）

1927年，英国侵略者非法进入云南沧源地区秘密勘探矿藏。1933年开始修筑通向矿区的公路，1934年1月派兵侵占佤族班洪和班佬等部落地区的银矿，激起佤族人民的愤怒。班洪王与班佬王邀集周围部落，剽牛立盟，誓逐英军，并组成3支武装，抗击英军。班洪抗英斗争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嚣张气焰，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


滇军在昆明举行出征抗日誓师仪式

使用农具锄头修筑滇缅公路

班洪抗英纪念碑 杜娟 摄影

滇军出省抗战（1937年至1945年9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8月22日，龙云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会议返回昆明，将滇军组编成陆军第60军、58军出滇抗日。1938年10月，从第60军和第58军各抽出1个师，在湖南长沙组成新编第3军。60军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坚守阵地27昼夜，伤亡达10000余人，阵亡旅团级军官6人，其英勇无畏，使日本的报纸也不能不承认“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此后，滇军还在著名的娘子关战役中，坚守九龙关、马岭关阵地，给来犯日军以重大杀伤；在中条山战役，防守中条山主脉，经浴血奋战，滇籍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阵亡，大部分将士牺牲。滇军子弟之英勇，在当时被广为称道。国内其他抗日战场上，还有一些云南籍将领，如罗炳辉、周保中等，为抗战作出了贡献。自1937年出滇抗战，八年抗战滇军10万余将士殉国，并且其中没有出现过伪军，“国之劲旅”盛名堪当。1945年，卢汉率领滇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是中国军队首次跨境受降。

云南各族人民抢筑滇缅公路（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下令抢修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东起昆明，西至中缅边界畹町，全长963公里，出畹町后与缅甸密支那公路相接。其中昆明至下关长410公里的公路需要改造；而由下关至畹町长553公里的公路则需要新建。12月，沿线10余县20余万各族人民在缺乏建筑机械的条件下，依靠肩挑人扛，使用农具锄头，在悬崖峭壁和深谷急流中用血肉铺出了一条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用短短8个月时间完成了一项连英美专家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伟大工程，在当时严重失利的抗战形势下，这对于国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使世界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滇缅公路的修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提高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滇西抗战（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

从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云南怒江以西大片国土，到1945年1月日寇完全被逐出滇西，中国军民在滇西抗战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滇西，连陷畹町、遮放、芒市、龙陵、腾冲，日军的铁蹄最终被中国军队顽强阻隔于怒江西岸，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滇西各族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干崖土司刀保图（字京版）就随同第5军到缅甸拒敌，后联合干崖司署和陇川、盏达、户撒、腊撒等土司，组织了一支义勇军，公推刀京版为司令，称“滇西边区义勇军”。继刀京版之后，畹町警察局巡官杨思敬于1942年6月成立潞西抗日救亡团；龙陵籍乡绅朱嘉锡在昆明成立了龙潞游击支队，7月抵达龙陵，8月投入战斗；前腾冲团管区司令、腾冲县务临时委员赵宝贤也于6月组织了抗敌大队。6月1日，李根源发布《告滇西父老书》，并分别给腾龙边区各土司写信，号召土司上层及各族人民要“抱定更大牺牲的决心，始能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始能在云南抗战史中占最光辉的一页”。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云南各族人民的命运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云南各族人民强大的凝聚力成为滇西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1944年9月14日腾冲光复，11月3日龙陵光复，11月20日芒市光复，1945年1月20日畹町光复，至此日本侵略者被完全赶出滇西。滇西抗战不仅以最早收复失地、彻底消灭入侵日军而载入抗战史册，而且对全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所）

文史笔记

高奣映的《鸡足山志》

□ 张旗

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号问米居士，云南姚安人，既是姚安拥有世袭领地的一方望族，也是清初一代著名学者。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高奣映应云南督学王之枢特聘，编撰完成卷帙浩繁的《鸡足山志》（以下简称高《志》）。该书广收博采，资料丰富，体例完备，其规模和成就远超以前诸种《鸡足山志》。

在修高《志》之前，高奣映已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他家和他外祖丽江木氏几代土司，都是鸡足山的大施主，与鸡足山渊源甚深，关系密切。他12岁时，父亲在鸡足山大觉寺出家，因此自小就有机会登临鸡足山游览，对鸡足山的人文历史、山水名胜、寺庙庵院、物产种种，博览旁搜，成竹在胸。接受编撰《鸡足山志》任务后，他在鸡足山仅花了七八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书稿。

高《志》卷六、卷七《人物》篇是该书的重头戏，是研究云南佛教史和鸡足山人文历史最为宝贵的史料。20世纪40年代，史学大师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是中国宗教史开创性著作之一，书中许多高僧的资料，就来自高《志》的《人物》篇。高《志》的《人物》篇，立传人物多达150余人，涉及帝王、名贤、禅师（禅僧）、律师（律僧）、净土、苦行，以及道教的神仙、黄冠和流寓的佛教信徒等，此外还有92位游山名流记载其中。不少享誉西南的高僧，高奣映都为他们写下了详细的“行实”。

高《志》卷三、卷四《名胜》篇，囊括了鸡足山所有的奇观异景，是该书另一重点篇章。无论是介绍景点的人文历史、地理概况，还是对自然景观的描写，都形象生动，充满诗情画意，有的章节段落，简直就是一篇篇精美的山水散文和叙事小品。高奣映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独具慧眼，为鸡足山景点进行了一次全覆盖的诗意化命名，文思妙曼，用词传神，其味隽永，诸如“胜概八景”“幽胜八景”“灵异八景”“异迹二十则”“古迹二十六则”，以及“四友”“四观”“四林”“四宜”等，淋漓尽致，异彩纷呈，再现了鸡足山山水名胜的面貌和神韵，对鸡足山旅游资源的开发，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高《志》卷八《风俗》之《檀施赋税》篇、卷十《艺文》之《宸翰》篇，对寺院经济、税收状况的记载，此前几部志书均无，是研究鸡足山寺院经济的珍贵资料。

高《志》卷十、卷十一《艺文》篇，将此前鸡足山文献几乎悉数收录其中，也是该书重点篇章之一。卷十主要收录宸翰、奏疏、序引、募疏、说论传、游记等散文体文章49篇，有云南名宦、地方名流的许多重要作品。其中，尤以冯时可、周复俊、王士性、大错和尚、李元阳、顾养谦、谢东山、范承勋的游记最有价值，这些文章记录了鸡足山的秀丽山水和极盛时期的盛况，最具文学价值。卷十一包括碑记、杂文、赋书、颂偈赞、额联，共164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碑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杂文中收录了明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八年（1580年），著名思想家李贽先后两次旅居鸡足山，诵读佛经，与法师讲经谈禅，时间长达约半年，写下的《念佛答问》《二十分识》和《六度解》，难能可贵。

高《志》不失为一部具有很高文史价值的名山志，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一切事物，都无法回避科学的追问。高奣映生活在封建王朝时代，受历史的局限，记载历史文化有思想认识的谬误，出现地理知识的混乱，在所难免，这是今天的读者不能苛求前人的地方。

（作者地址：宾川县第三中学）

2003年出版的芮增瑞校注高奣映著《鸡足山志》封面